

TONG HUO PENG ZHANG YU JING JI ZENG ZHANG

通货膨胀与 经济增长

TONG HUO PENG ZHANG YU JING JI ZENG ZHANG

主编 张幼文 副主编 翟祥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此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主 编：张幼文

副主编：翟祥龙

425.37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范健平

封面设计 邹越非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主 编：张幼文

副主编：翟祥龙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浙江诸暨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125 字数170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15-682-4/F·220

定价：3.60元

作者的话

本研究开始于1988年末，最初由本书各作者经集体讨论后分头执笔写出一份约四万字的“简稿”，内容与本书相近。“简稿”以油印形式分发后，受到不少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注。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分别连载了近十次，《世界经济研究》也摘要发表了主要理论分析内容。1990年，本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研究项目专款资助，这为进一步研究和“详稿”的撰写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书由张幼文制定编写框架，由翟祥龙负责统稿定稿。各章撰稿人是：导论：吴伟卿、张幼文；第一章：翟祥龙；第二章：林晓东；第三章：翟祥龙；第四章：张幼文；第五章：奚方；第六章：潘德洪；第七章：王伟军；第八章：庄勤；第九章：张宏伟；第十章：张幼文；第十一章：尤安山；第十二章：尤安山；第十三章：傅念祖；第十四章：傅念祖；第十五章：翟祥龙。在审定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王惠珍、王日庠、杨思正、甘士杰、张守谦和刘琳等同志的帮助，其中王惠珍、甘士杰同志还撰写了部分内容。

由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本来就是很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针对中国实际进行有侧重的分析研究难度更高，因此，本书浅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望理论界和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

1991年3月

序 言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当纸币发行数量超过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时，就会导致通货贬值，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二次大战后，通货膨胀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不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通货膨胀，只是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在50和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一般是较温和的，物价上涨幅度较小，但通货膨胀率有缓慢上升的趋势。到了70年代，以1973—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转折点，各国通货膨胀普遍加剧，物价上涨幅度增大，有些国家在某些年份，通货膨胀率甚至高达两位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生产甚至停滞不前，失业率上升，失业人数剧增，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所谓经济“滞胀”。经过80年代初的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通货膨胀得到缓和，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但失业率仍然居高难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在70年代经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了80年代，有的国家甚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之所以在70年代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各国实行“需求管理”，不仅在发生停滞和衰退时期，甚至在经济增长时期也都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廉价货币政策，以增加所谓“有效需求”，刺

激经济发展，达到所谓“充分就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起通货膨胀性的物价的持续上涨，开始时是温和的、“爬行式的”，随着通货膨胀的持续存在和通货膨胀预期心理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周期剂量的不断加重，通货膨胀逐渐加剧，通货膨胀率逐步上升。虽然每次经济衰退使物价上涨率有所下降，但几乎每次衰退过后物价上涨幅度一次比一次升高，最终导致两位数通货膨胀的出现。而通货膨胀的加剧和通货膨胀预期心理的加强，使投资获利前景难以预测，实际利润率下降，最终使经济增长率降低甚至停滞不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长期干预经济的负效应可以说是引起70年代“滞胀”的最重要的原因。此外，70年代两次能源危机和油价的大幅度上涨，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出现的技术革命高潮的低落，引起大规模投资的相对缩减，也是导致和加剧70年代经济滞胀的原因。发展中国家所以出现“滞胀”，固然是内因为主，或多或少与政策失误有关，而外因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滞胀”，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渠道，“传递”到发展中国家。不管哪一种类型的国家，如果通货膨胀的势头得不到抑制，迟早将引发通货膨胀加剧与经济增长放慢和停滞同时并存这一顽症。因此，要实现低通货膨胀与经济适度增长这种双目标，首要的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举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大旗，在对妨碍社会主义发挥其优越性的经济体制实行大力改革的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从1979年到1990年的12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9.1%，显著高于1953—1978年26年期间年均增长6.1%的速度。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改革开放的12年中，居民实际平均消费水平年均提高6.5%，比1953—1978年期间年均提高2.2%要快得多。提前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正在向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改革开放10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举世瞩目。与此同时，经济也出现过热现象，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发展很不平衡，前者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后者，拉动物价上涨，到了80年代下半期个别年份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改革初期，物价比较平稳，零售物价总指数1979年上升2.0%，1980年6.0%，1981年2.4%，1982年1.9%，1983年1.5%，1984年2.8%。可见，从1979到1984年止的6年内，除1980年上升6.0%外，其他年份均在2.8%以下。但从1985年起，零售物价总指数上升幅度扩大，1985年上升8.8%，1986年6.0%，1987年7.3%，1988年高达18.5%，1989年17.8%。1988年8月份在全国一些城市还出现从银行大量提款抢购生活用品的现象，群众通货膨胀预期心理大大增强，经济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经济将濒临危机。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的决策，旨在压缩社会总需求，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其中心就是要抑制有失去控制危险的通货膨胀，保证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随着治理、整顿措施的出台，初期物价继续上涨，1989年1月份零售物价总指数按年率计算上升27%，2月份更升达27.9%，而市场疲软，生产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一时

间，学术界议论纷纷，耽心发生经济“滞胀”，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如何避免经济滑坡，以实现较低通货膨胀下经济的适度增长，成为各界人士普遍关心的热题。

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既有与其他国家共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通货膨胀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有其特殊性。我们必须找出这种特殊原因，在采取有效的抑制措施的同时，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防止滞胀的出现。

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同样是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过量发行。这与其他国家有其共同性，但是我国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却有其特殊性。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我国在坚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开始引进市场机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行地方财政包干，下放投资管理权，对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其自主权等一系列经济改革，这对于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主动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但由此也引起了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在我国原有体制下，国家从长远利益考虑，并且作为所有权的唯一代表，承担着投资者的身份，必须从国民收入中获得积累基金。为了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往往急于求成，倾向于提高积累率，相对地限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应提高。一旦实行改革开放，人民渴望较快改善生活条件，政府也首先关心提高人民消费水平，较大幅度地增加工资奖金；另一方面，对外开放进口了一些高档消费品，国外的高消费也通过大众媒介和人员来往传递到国内来，进一步推动了居民追求较高的消费水平。同时企业因自主权的扩大，倾向于尽可能提高职工的工资、奖金和福利。而相互攀比的结果，促使国民收入分配向消费倾

斜。政府在急于求成和追求高速度的思想指导下，力图维持原来的较高积累率，从而使财政收支发生赤字，并主要通过增发货币以资弥补。随着投资管理权的下放和地方财政包干制的实施，地方当局为了追求本地区的利益，力图扩大投资，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人民银行的资金信贷业务虽然由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但地方人民银行在行政和组织上归地方当局领导，其领导人也由地方任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提出的高额投资要求有可能通过行政、组织关系，由地方银行向本地区的有关机构和企业发放相应贷款而得以实现。各地区的竞争以及对生产某种有利可图产品的投资一涌而上更加剧了这种情况。这样形成的投资膨胀必然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并使贷款总额突破人民银行总行的贷款计划，导致货币过量发行，通货贬值和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当通货贬值和物价上涨后，劳动者必然要求增加工资或奖金，以弥补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结果形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在这种物价轮番上涨的条件下，居民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心理，降低储蓄的意愿，甚至动用过去的储蓄向银行提款抢购或囤积各种消费品，扩大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因此，我国的通货膨胀是由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所引发的。而在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两者之中投资膨胀是主要的。因为从国民收入最终分配来看，开放10多年来除初期少数几年外，积累率都在30%或30%以上，而且消费所以得以膨胀，也往往由于投资膨胀所引起。据统计，投资总额的40%左右转化成为居民的购买力，加剧了消费需求的膨胀。正如李鹏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总的来看，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我们的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

往往忽视国家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在指导上对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攀比发展速度等现象注意防止不够,纠正不力。”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治理整顿经济的方针。李鹏同志在同一报告中说:“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经济过热、需求过旺引发的,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当然需要从压缩社会需求和增加社会供给两方面作出努力,但是先必须毫不动摇地把过大的社会总需求压缩下来。”具体措施:首先是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这是对压缩社会总需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措施,为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全局的首要任务。其次是相应控制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坚决压缩和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严格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大力提倡和鼓励人民储蓄。再次是在压缩社会总需求的同时,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还必须在金融和财政方面都实行紧缩,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货币发行。

贯彻了这些措施以后,效果明显。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1988年下降了11%,压缩近500亿元;消费需求增涨势头有所减缓,职工工资总额增幅比1988年下降了9.1个百分点,货币投放量显著减少,1989年全年发行货币210亿元,大大低于1988年的680亿元;物价涨势逐月减弱,零售物价总指数按年率计算1月份上涨27%,2月份27.9%,以后逐月回落,12月份仅上涨6.4%,全年平均上涨17.8%,略低于1988年的18.5%。1990年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仅上升2.1%,大大低于1989年的17.8%,可以说,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

但与此同时,市场疲软,库存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经济增长率1989年为4%,1990年为5%,工业生产在

某些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是财政、金融双紧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付出降低经济增长率的代价，这可以说是一般规律。从1991年1月份起工业生产开始较大幅度回升，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必将高于去年。因此，在我国并未出现高通货膨胀与停滞同时并存的经济滞胀。不过，通货膨胀率的迅速下降主要是通过行政干预、硬性控制物价所实现，造成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并未得到解决。如果不切实解决这些深层原因，随着固定投资的增加和银根的放松，通货膨胀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为此，必须在物价得到控制的同时，深化改革，形成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机制，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方能巩固已取得的成就，真正做到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地发展。

当我国通货膨胀加剧，在1988年7、8月份发生提款抢购以及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整顿的方针时，有人担心出现经济滞胀。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些青年研究人员急人民和国家所急，成立课题组，研究不同类型国家克服通货膨胀，实现低通货膨胀与适度经济增长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初步研究成果在有关报刊上发表系列文章，供有关部门借鉴之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写成专著，并且立项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使该项研究成果得以出版面世。这些青年研究人员抓住热点课题，使世界经济研究着眼于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精神可嘉，但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尚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姚廷纲

导论：抑制通货膨胀与实现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

抑制通货膨胀与实现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致力于实现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然而，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中，这两大经济政策目标都表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以致于如何同时实现两大目标往往成为所有政策设计的核心问题。

在建国后的40多年中，经济的多“冷”、“热”波动，政策的多“松”、“紧”摇摆，从这个角度看，也同样是在这两大目标之间的权衡与抉择。近年来的发展过程更显示了同时实现两大目标的困难，表明了这一研究的迫切性。

中国经济改革的极端复杂性，经济模式转换时期经济运行机制的多重性，产业间、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二元性，使我们只能从全面来研究世界各类经济，在比较与综合中寻求借鉴。本研究就是这一构思的产物。

自从70年代西方经济陷入“滞胀”以后，西方经济学与政策研究集中在滞胀发生的原因与治理滞胀的对策上。事实上反通货膨胀的理论并非以单纯降低通货膨胀率为唯一对象，而是以不牺牲或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前提的，否则问题会简单得多。在这篇导论中，让我们首先简要地看一下

西方治理通货膨胀的理论前提。

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相互制约还是相互促进？理论上莫衷一是，统计上难以证明。有的国家创造了低通货膨胀下经济增长的奇迹；有的国家陷入了高通货膨胀下经济停滞的困境；有的理论认为适度通货膨胀是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有的理论对此断然否定。然而，不管怎样，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实现经济增长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至少是不能接受的。而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停滞对中国人来说也已不堪回首。我们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增长。西方的滞胀走在中国之前，其对策理论也在中国之先。如果说这些理论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条件的根本不同，那么，是否也同时启示了：为达到对中国经济的可控性——能借助上述政策工具系统在抑制通货膨胀中实现经济增长——我们首先应做什么呢？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对抑制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作一点理论剖析，以便使我们对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定义，经济增长就是经济体系在一段时间内生产的货物和提供的服务数量的不断增加。这里，经济体系既可是某个国家，亦可是某个地区或集团。因为货物和劳务绝对量的增加一般总伴随着人均物质福利的增加，所以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应包括经济福利的增加。西蒙·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反映不断增加的提供给增长人口的人均货物与劳务的能力”。一般说来，总产值和人均产值的增长可正可负，而且两者并不一定同方向。然而，绝对数量的增长的概念亦被广泛地接受。人们提到经济增长通常是直接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只要想一想我们听到经济奇迹就会联想到那些高速增长的国家如日本、联邦德国和南朝鲜等，就可以知道经济增长有多么的重要，也就难怪有些人把经济增长视若神明，甚至轻视通货膨胀的社会后果。然而，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却没有一个是用通货膨胀来创造奇迹的，因此也就更有必要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经济学中，短期的经济增长着重研究充分就业问题，即愿意就业的人都能找到工作，除了结构性的失业之外，如摩擦性失业或季节性失业，没有自愿失业者。由于在短期中，产出直接和就业率有关，因此短期的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充分就业，没有开工不足的现象。长期的经济增长着重研究三个基本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增长，资本形成和技术变化。其中，资本形成是生产能力增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因为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文化习俗传统决定，而技术进步则有赖于大量的资本积累。正是通过资本形成，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

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特征被认为是：（1）广泛地利用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2）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近年来有证据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相对而言，劳动投入的增长，影响则较小。GNP平均每年以5%以上的速度增长被认为是高速增长，2%—4%为中速增长，2%以下则为低速增长。

通货膨胀的一种比较通行的定义是指货物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普遍持续的上升。这个定义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1. 货物和劳务。通货膨胀不是指债券、股票或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而是指有形或无形的、由生产者生产出来并

销售给他人的经济物品和提供的劳务的价格上涨。

2. 货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不是指相对价格的变动，而是指商品的绝对的货币价格水平的上涨。

3. 持续的上涨。这里不是指价格水平“高”，而是不断地增“高”。因此，国家征收的一次性消费税而导致的价格上涨就不属于通货膨胀。这里，经济学家强调的是“持续的上涨”，而不仅仅是“上涨”。

4. 普遍的上涨。一种商品或少数几种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并不构成通货膨胀。

目前一般的解释是，虽然各种因素如能源价格的冲击、收入政策的失误、汇率过低，以及财政赤字，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是过快地和不稳定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是一切国家的经济政策所追求的两大大目标。每个国家都希望有一个经济波动涨落得到缓和的环境，避免经济过热和经济滑坡的现象。而那种螺旋上升或慢性的二位数字的通货膨胀被人们称之为“九头怪蛇”。就价格的长期趋势而言，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目标：

1. 稳定的价格。货币工资上涨幅度等于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同时价格水平保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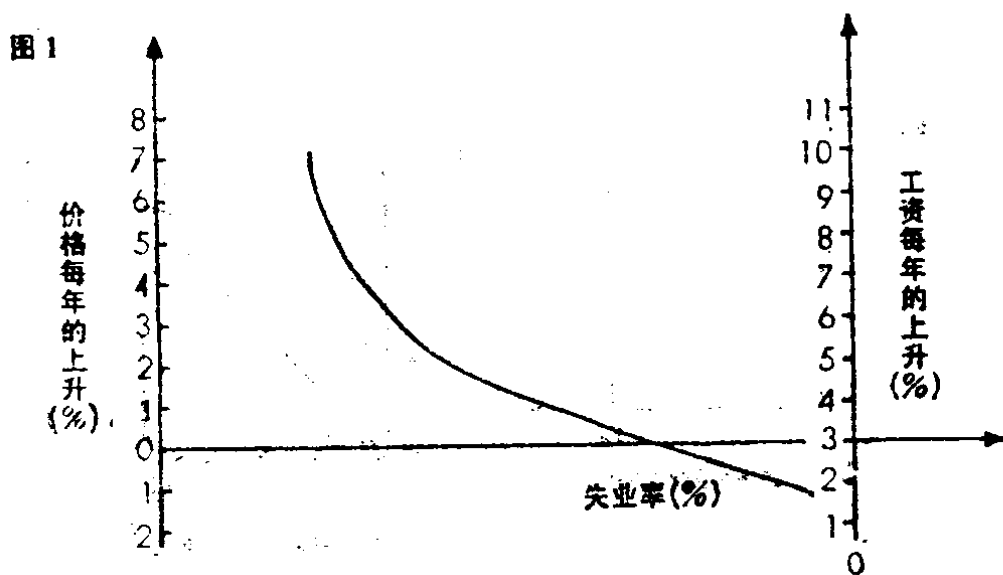
2. 轻微上升的价格。当生产率和高度就业的产出提高时，货币供给总额增加更快，导致价格的轻微上升。同时，货币工资上涨幅度等于价格上涨幅度和生产率增长幅度之和。

3. 轻微下降的价格。货币工资保持不变，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商品价格下降的方式出现，这种价格下降应是小幅度的。

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生机勃勃的时期一般属于价格稳定和价格轻微上升的时期。在价格轻微上升的情况下，企业更愿意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开拓市场、维持高度的就业水平。

西方经济学研究失业和通货膨胀相互关系的工具通常是菲利普斯曲线。过去，人们也经常用总需求和总供给曲线，但这一方法以生产和物价水平为重点，不象菲利普斯曲线那样直接以失业和通货膨胀为中心。

1958年，执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注意到了货币工资的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的、有经验依据的关系。图示是典型的菲利普斯曲线。低失业率通常意味着高的劳动力需求水平以及较高的总需求水平。当总需求高时，货币工资增长迅速，而总需求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缓慢。由于货币工资就是生产成本，价格增长率就和失业水平之间有了一定的联系。



这条曲线有三个特征：

1. 斜率为负的。这是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成反比。失业率越低，通货膨胀率越高，反之亦然。

2. 显然，曲线向下凹，不是直线。由于曲线的斜率不断减小，这意味着不断降低的失业就要以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

3. 此曲线在 x 轴的截距为正，意即零通货膨胀必然有一定量的失业。

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或菲利普斯曲线可以概括地说明西方各主要经济学流派对抑制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增长的不同阐述。

1. 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互不相容的。他们认为只有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才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由于在一个经济体系中，总供给是固定的，即充分就业的产出量，因此，当总需求小于充分就业产出时，只有失业现象而没有通货膨胀。而当总需求大于充分就业产出时，就只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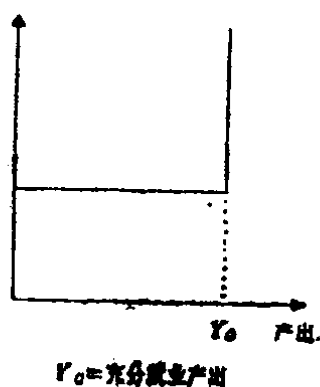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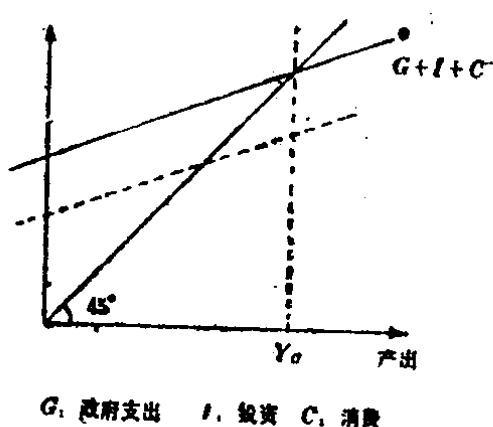


图3



对于这种理论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政府的药方也最为简单，当通货膨胀为零而存在失业时，扩大总需求，政